

求援与自助——宋庆龄与她的救援工作

周晶

【摘要】宋庆龄作为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开拓者，为人民谋福利是她毕生的崇高目标和追求。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以后，宋庆龄搭建起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并希望中国抗日战争能得到世界各国的全力援助。宋庆龄的呼声和威望得到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的响应和支持，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送来中国。然而，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和国际形势的变换，宋庆龄的救援工作也遇到了诸多困扰，例如救援物资质量欠佳、西方某些国家元首左右逢源的含糊态度、某些外媒利用救援工作对中国的形象进行恶意攻击、欧战爆发使外援一度中断等等，使宋庆龄在感谢外援的同时也越来越感受到其不可确定性。下面，笔者从各类文献资料及宋庆龄的来往书信中搜寻雪泥鸿爪，梳理她在寻找外援时所遭遇的各种困境及应对方式。

【关键词】 外援 自助 依靠人民

一、 救济物品质量欠佳使救援工作受阻

自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响之后，宋庆龄就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以争取外援来支持中国抗战。她一直在各种公开场合向全世界呼吁支持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正义斗争，并一再强调外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宋庆龄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是全人类进步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步”，因为“日本在中国的失败，将意味着西半球民主的安全”，而且只要“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完全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主”，“中国巨大的生产力”将“使整个世界受惠”。但因中国当时“很多方面都很落后”，尤其是“医疗和救济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外国友人的捐赠”。所以，“中国的广大人民需要全世界的朋友和同情者的大力援助”。^①

宋庆龄的呼吁和号召得到了中国的朋友们和同情者的积极回应，被送到中国的捐赠物资开始增多，用于救济难民和支援抗战，但是，还有某些所谓的援华团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P394。

体味于情势，没有及时认识到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把一些弃之不用的东西当成捐赠物资送于中国。

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在1939年访问了一些中国军队后，就某些外国团体向中国伤员们提供的自认为合适的医疗援助用品，无比嘲讽地说：

“外国在援华中力求使自己丢脸方面，似乎在互相竞争。美国红十字会和德国红十字会捐送的是1917年生产的药品和绷带——他们自己无法使用的上次世界大战的废物。这些东西仍然无用地躺在新四军医院的搁架上。谁要谁就拿去，部队不能使用。”“不久以前，……一批运来的捐赠器具不仅是所标明的二手货，而且已生锈无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危险的。我们愿意告知所有的援华团体，虽然在落后的条件和各种用品奇缺的情况下，无论怎样不起眼的捐赠都将受到极大的欢迎，但是对中国伤员们和那些尽一切努力医治中国战士们的优秀医务人员来说，运来明显无用的设备则是一种侮辱。”^①

战争期间运送救援物资，路途遥远难行且费用昂贵自不必说，另外，还要突破日军和国民党政府重重的交通封锁，当救援物资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却被发现因低劣的质量而无法使用时，不仅让受援者的满心期待化为泡影，同时也使与之有关的所有努力付之于流水。这，难道还是出于善意的人道主义救援吗？

宋庆龄对救援物资出现质量问题表达了极度的愤慨，认为“作进一步的协商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但即使物资匮乏，资金短缺，中国人民的抗战不能因此停止，生活还要继续。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在更努力地争取外援的同时，鼓励当地军民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保盟的《新闻通讯》中对此进行了报道和记载：因为缺乏药物，“八路军试图用草药制成某些药品”，药草煮出药汁后，为了方便携带，“药汁或者灌入瓶里，或者与面粉和在一起，做成药丸或药片”，制造车间“还以非常原始的方法生产脱脂棉花和纱布”；如果医生需要动手上，……在日光下工作（做手术），利用电筒作辅助照明”；没有毛毯御寒，“八路军建立了一个毛毯厂，但由于生产方式落后，产量很低……”他们“还沿街和从贫苦人家那里搜寻废铜烂铁”、“旧茶壶、旧的厨房用铁器，日本炸弹的碎片”以及“被日本人炸弹炸碎了的澡盆和水槽的残片”，拿来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战地记者们惊叹于中国老百姓在如此艰难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乐观精神和对生活无比

^①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P49。

的信心，认为中国虽然暂时失去了“主要城市、沿海港口和大的工业中心，但正在……建设新的生活，并在那儿找到了力量所在。”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这一胜利，“将是道义上和军事上的双重胜利。”

二、 西方国家的“中立”使援助效果打折

以广阔的视野来观察世界局势，使宋庆龄高瞻远瞩，目光深邃。宋庆龄从全球反法西斯联合阵营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所有反法西斯的国家应该是一个整体，中国作为其中的东部战场，有权力要求其他国家给予援助和支持。各国群众对宋庆龄的呼吁给予了鼓励和支持，如英、美部分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输日货物、妇女拒用日本丝袜等等。但英、美为首的一些西方政府却态度含糊，一边向中国的守卫者们表示同情和赞扬，一面向侵略者提供赞助。英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曾一度关闭了中国的运输生命线——滇缅公路，华盛顿则以中立为借口不顾“人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一边”，准许向日本出口石油、废铁及其他战略物资。

德裔加拿大人 S·洛登凯泽教授在中国当了 18 年的传教士，中国的战争使他从一个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转为认清每个人积极抵抗罪恶侵略的责任。《新闻通讯》曾转载了他的文章——《一个基督徒谴责对重庆的轰炸》，文中，洛登凯泽教授言辞犀利地道破了那些资助侵略者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那种既不愿放弃因中国的战祸带来的巨大财富，又怕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的唯利是图的自私心理。他以一名基督徒的身份，极力呼吁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和团体都要放弃的在日本的“铁和石油的利润”，因为这种资助行为“是有罪的”，他呼吁西方所有善良的人们，停止对日本的援助，让日本“不能继续屠杀中国”。^①

面对与中国同在反法西斯阵营的美、英等国的摇摆不定，宋庆龄多次撰文表示谴责，她在《中国、世界和你们》一文中写道：“如果及时得到全力支持，中国对国际强暴势力的应战，本已成为和平大厦的奠基石，足以阻止目前在世界范围爆发的大屠杀。尽管中国没有得到这种支持，但仍然坚持着这种应战。”^②

在对外谴责的同时，宋庆龄认为中国在这场对日军的战斗中能否取胜取决于国民是否能团结一致，因为“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

①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P38。

②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P170。

力量是我们抗日持久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①“当日本军阀正威胁我们国家独立的时候，在群众中必须实行军事教育。只有群众起来保卫国家的独立，中国才能得救。”^②

她要求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要全民动员参与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摸索，“我们才能懂得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才能“真正了解世界局势及我们自己的情形”。

宋庆龄领导“保盟”一直资助民众的各种学习活动，《新闻通讯》里描述了敌后人民参与学习的场景：对孩子们主要是进行体育和思想教育，目的是为了早日投入抗战；妇女们在工作之余被她们的孩子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新思想的世界”，一起进入夜校或扫盲班学习；军官要接受开展军队的地方政治工作的培训；教员也要经常学习和探讨如何提高教学水平，讨论政治和军事问题。

人们用各种方式学习：他们在窑洞里建起抗日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培训学生创作各种战斗歌曲、小歌剧、戏剧到各地演出，孩子们成立了学习小组，每组中较聪明的孩子担任“小先生”，用即知即传的方式带领其他孩子学习，并且举行竞赛，鼓励孩子们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对知识的追求；士兵们在体育竞赛之后会歌唱爱国歌曲，呼喊民族解放的口号以鼓舞士气；战地记者在培训学校作报告，讲述各人民团体为抵制日货、筹募款项和医疗用品开展的各种活动，听报告的学员认真记下讲话内容，然后印发给部队学习；指挥官给农民们分析日军强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怎样使自己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中国要想战胜日本，就必须所有人都团结一心。

通过学习，人民知道了他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的原因。为了赶走挑起战火的侵略者，他们决心站起来，用农具、用刀甚至用自己的拳头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机械化部队战斗！一个因战争失去亲人的孤儿说：“直到两年前，我仍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一员。……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主义，也不知道除了父母、姐妹、兄弟外的任何东西。日军侵略者来了，把他们的毒烟烧到了我们和平的村庄。……现在我来到了这个孤儿院，……我要学习和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③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P267。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 P177。

③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P182。

通过学习，军民之间的联系也空前地紧密起来。教会护士凯瑟琳·贺尔小姐1939年12月前往晋东南和晋东，以数月工作的见闻写下一篇长篇报告，其中写道：“因日本人焚毁了几千个村庄”，所以，“今年冬天，农民们和八路军将面临极大的困难，没有食物，没有住处，没有御寒的衣服。农民们因为支持八路军，生活更苦些，但他们没有怨言。日本人的愿望是饿死八路军。八路军则在尽一切可能地帮助民众，为他们寻找住处和食物。军队每天只吃两顿小米和萝卜汤，他们要把食物分给民众。”^①

宋庆龄无比欣慰地看到，全民参加学习的结果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为祖国自由而战的队伍中的地位，每个人对战争的结果都有必胜的信心并且竭尽自己的全力，她坚定地说道：“我们中国，……必能获得最后胜利。……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全人类……争取自由。”^②

三、 宣传工作缺失使救援工作进程迟缓

西安事变爆发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后续的抗战进程中，中共领导的部队尽管属于统一战线并依靠游击战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复了成片的中国领土，却得不到应有的军需给养和医药供应。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取得支援的物资后，在分配时，“既未能根据最危急的需要，又未能按照捐献人的意见做到合理”；另一方面，外国的朋友们因为缺乏正确的详细的资料或是媒体的歪曲言论，对遥远的中国所进行着的战争的真实情况的了解是“极不充分的，因此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援也就遭到阻碍”。^③

于是，宋庆龄在建立保盟的基础上，又陆续创办了英文版《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新闻通讯》）和《保卫中国同盟年报》，记述中国战争实况和实际需求，传达中国人民不可摧毁的战斗意志，并且希望世界人民对中国增加新的了解、同情和积极援助。为了使文章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且便于外国朋友理解，宋庆龄不但邀请好友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新西兰作家、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等人参与刊物的撰文和主编工作，并且还邀请或者协助许多援华机构的相关人员到实地勘察他们所援助的项目，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而他们在中国的考

①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P291。

② 《宋庆龄年谱》上册，P678。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P231。

察经历也被详细记录并撰写成文刊登在刊物上。

埃文斯·F·卡尔逊少校代表工合美国促进会对中国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工业合作运动进行了实地调查，卡尔逊少校看到在新四军所在的皖南地区，工合运动正在持续发展：合作社种类包括：造纸，麻布，纺线，织布，毛巾，制碱，面粉，烧炭，制鞋，裁缝，制伞等等，基本能维持当地军民的生活，但仍旧缺少“设备和资金”，并且急需“医疗物资和冬衣”，“为了提高这一地区的生产数量，对战士们的妻子和家属进行培训的前景也是非常广阔的”。^①

美国基督教学生运动代表安德鲁·T·罗易在中国西北的窑洞城市里寻找这里“吸引青年人的秘密所在”，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西安、延安等的走访中，看到了中日交战双方的一些情况：中国采用游击战后，中国人的伤亡比例大大下降，这改变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官员们正视现实但很有信心。他们还不能与日本人正面对阵，但他们使敌人不停地消耗人员和装备”，而日本，即使在没有作战时，每天供养军队开支也十分巨大。“日本……已陷入僵局，继续推进意味着沉重的损失，并无实际收货，而是增加了后方真正的危险。”而中国人民“各种势力不同寻常的合作，普遍的愿意作出牺牲，不存在阶级差别，对目前事业的共同信仰，以及所采用的方式”，使安德鲁和他的伙伴们对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中国将依然是她自己命运的主人，将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后，变得更强大。”^②

在所有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保盟的刊物得到了中国的朋友们和同情者们的关注和支持，人们看到一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看到因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在困境中继续坚持并奋斗着。于是，源源不断的捐赠物资和款项经由宋庆龄和“保盟”送到中国正在坚持抗战着的人们手中，虽然捐赠物品的数量仍然远远不够，但还是给予了人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宋庆龄对每一份捐赠都发自内心地表示感谢，她不仅经常给捐赠人写回信，把收到捐赠的物品和钱款的来源、去向、用途都公开刊登在“保盟”的刊物上，以此让捐赠人明白自己捐出的钱和物都用在哪儿。

《新闻通讯》第11期刊登的《援助医疗用品的活动》详细记录了所受到的

①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P264。

②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P44。

捐赠物资的清单及其去向：“新西兰左派图书俱乐部的 1100 条毯子、一些药品和含糖炼乳；美国医疗援华会的 10 捆毯子和 9 箱医疗用品；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的 40 箱毯子、绷带和衣物；香港 C·S 橡胶出口公司的 50 打外科橡胶手套”，且这批物资，“已……启运，经海防和贵阳运往国际和平医院和新四军的医疗部门”。^①

四、 国际形势的变换使外援无法保障

1938 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吞并了奥地利，随后又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军事和经济实力大增，加速了其侵略扩张的步伐。战乱使西方国家自顾不暇，以至于对中国的救援大幅减少。宋庆龄 1938 年在《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中说道：“最近欧洲的形式已明显告诉我们，想依靠外国的拔刀相助，都只能使幻想。……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的同胞，广大的农工知识界，以至真正努力于抗战的人们。”^②

相对于美、英等国时有时无的援助，海外华人捐赠的款项和物资总能定期送到“保盟”。爱泼斯坦曾经采访过一位从海外归来的老妇人，老妇人回答他说：“哪里的日子都难过”。要是外国人“把我们压得太狠了，我们可以回来。可是日本人想要夺走我们的家。要是我们没了家，我们还能去哪儿呢？”这些海外华人虽然身在异乡，但仍心系祖国。他们都是热情的爱国者，坚定并强烈主张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因为他们相信，中国获得自由和民主，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他们自己在国门外才不会受到歧视，才能获得平等的对待。宋庆龄 1938 年 9 月 15 日在华侨抗日动员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热烈赞扬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援助，指出“政府……对海外侨胞、救国团体，应加强联络，经常给以政治上精神上的帮助，……更多为华侨谋福利，以提高政府在华侨中之威信。”^③

所以，自 1941 年开始，保盟的《新闻通讯》增出中文版，面向香港地区的有关人士和海外各地华侨社团。依靠全国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智识出智识”。而就救济工作来说，“我们要创办和维持一些可以自给自足的工作计划”。

1939 年，由“若干中国人士和同情我国的外籍友人所发起的工业合作运动”使宋庆龄看到中国经济恢复的希望。她认为这个“把工作者和生产者组织起来的

^①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P112。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P255。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P249。

运动”是一种“以人类复原为旨趣的运动，它以适当的工作给予各种人等，而且给以永久的工作。”当时，中国沿岸因为遭到封锁，于是内地对于工业品的需求日益迫切，所以这实在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黄金时代。”宋庆龄认为工业合作运动必将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是“生产者自身的运动，同时也是为生产者而发动的。若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她对工合运动寄予厚望，认为它不仅可以使“人民的生活程度一定迅速高长”，同时也可以“销除东方劳力廉贱的传统陋弊”，所以，工合运动不仅“是有利于中国，实在是有利于全世界的”。^①

所以，自工合运动发起，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盟”就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关注它，宋庆龄多次发表演讲，请求中国的朋友们为工合运动捐款捐物，1941年7月1日，宋庆龄等为工合运动筹款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用发售餐券的形式作为募捐赈济的形式，每一名认购者可以拿着餐券到指定餐厅吃炒饭一碗，而除炒饭成本以外的饭钱则用于支持中国的工合运动，宋庆龄在报端发表题词称：“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活动得到中外人士的积极支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工合运动除了给中国经济的恢复带来了希望，也在宋庆龄的难民救济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的军事行动，人为破坏黄河堤坝，致使河水多次泛滥。连年战乱加上水灾使大量难民流离失所。1940年10月保盟通讯员一篇名为《中国北方的水灾难民——一项生产救济方案》中写道：“合作社吸收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使他们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振奋起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的工作对中国的战争具有价值”。美国战地记者在《中国的经济战线》中写道：难民在合作社中“得到了良好的薪给、分得红利”，其中几个徒工，“如果没有合作社来照顾他们，这些孩子也许将在重庆的街头流浪，成为社会的累赘，而不能为中国未来的需要贮备力量了。”还有“跛足的伤兵”，为了抗战他们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行动能力，但合作社的工作使他们免于沮丧和对生活失去信心，并且做出有益的贡献。“社员们生活安定而充满信心。”“他们正在为中国的需要而工作、创造、取得进步。”^②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P298。

②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P277。

“他们很快学会了把他们的产品相联起来，这样造纸合作社使用石灰合作社烧出的石灰，榨油合作社向木器和制伞合作社提供产品……到目前为止，工合已经把组织起来的 120 种行业的生产者，联系为一体了。”“工合正在致力改善人们的生活。它并没有停留在空谈上，而是为支援国家，真正地把人力物力资源汇集在一起。”^①

五、 结语

宋庆龄说：无论战时还是战后，中国人民从心底感谢各国的群众运动给予中国的支持，但她同时也指出：国民的自立自强才是建国、强国之本。1944 年 3 月，宋庆龄在美国作广播演说中驳斥所谓中国“有依赖外国的倾向”，指出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固然需要外援，但绝不依赖外援，且绝不放弃独立自主的神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整理财政、稳定物价、恢复经济、救灾治难等方面都取得了“英雄史诗似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变得日益美好，各民族人民可以前所未有地平等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而“全国坚如磐石的团结，也是空前未有的”。中国不仅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并且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平等、友好、互助的外交关系。从一个战时的“受援者”的转变成了胜利后的“捐赠者”。真正实现了宋庆龄提出的“自助而后助人”的伟大目标。中国的巨大改变让宋庆龄深信：“中国人民有无比的力量，磅礴的生命力和卓越的天才，有了这些，就可以解决一切困难。”而对于她一直从事的福利事业方面，她认为在新中国，“福利的享受被认为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我们的福利工作“在健全的环境里发展着，变成了国家生活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她指出：在新中国，福利事业虽然“仍旧是人道主义的，但是它的办法是积极的，目的在于最后消灭对救济的需要。”，即使遇到“紧急救济”，它也“有确定的开始，确定的方法和确定的终点。”

作者简介：周晶，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宣教部文博馆员。

^①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P340。